

社会学的想像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Wright Mills

C·赖特·米尔斯 著

陈强 张永强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社会学的想像力

C·赖特·米尔斯 著

陈强 张永强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学的想像力：第3版 / (美) 米尔斯著；陈强，
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1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4187-6

I. ①社… II. ①米… ②陈… ③张… III. ①社会学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7945号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opyright © 1959, 2000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N. Y. U. S. A

This translation of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U. S. A (中译本已获原著版权持有者授权)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扉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1年7月北京第1版

2005年3月北京第2版

2012年11月北京第3版

2012年11月北京第6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 数 182千字 图字01—2000—2277

印 数 30,001—35,000册

定 价 28.00元

学 术 前 沿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

献给 Harvey 和 Bette

目 录

第一章	前景	1
第二章	宏大理论	25
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54
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实用性	82
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	108
第六章	科学哲学	128
第七章	人类的多样性	142
第八章	对历史的运用	154
第九章	论理性和自由	179
第十章	论政治	192
附 录	论治学之道	211
致谢		248
索引		250
译者后记		260

第一章 前景

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

3

造成这种跌入陷阱的的感觉的,是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结构中出现的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与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当一个社会完成了工业化,农民会变成工人,封建地主会被清除或是变成商人。随着阶级的上升或下降,人们或是找到工作或是被解雇;随着投资率的起伏,人们或是发财或是破产。当战争爆发,保险销售商成了火箭发射员,商店职员成了雷达控制员,妻子们独守空房,孩子们在没有父亲照料的环境下成长。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

然而,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他们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一般不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归因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大规模起伏变动。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

4 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那些对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他们并不具备。他们不能通过诸如控制通常在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方式,处理好那些个人的困扰。

这当然不足为奇。有哪一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人以这么快的速度去面临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其他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一样,美国人也不了解这种巨大的变化,因为现在历史事实在迅速地变为“仅仅是历史而已”。现在,影响每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站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在一代人中,有六分之一的人从封建的、落后的状态进入到现代的、先进的而又令人惊惧的状态。政治殖民地独立了,新的形式更隐蔽的帝国主义却站住了脚跟。革命爆发了,人们却感到受新类型权威的严密控制;极权主义社会出现了,又被摧垮,或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取得成功。在经过两个世纪的上升期之后,资本主义显得只是一种将社会变成工业机器的手段而已,经过了两个世纪的美好企盼,即使是形式民主也仅在很少一部分人中实现。在不发达的世界,古代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朦胧的期望变成了迫切的需要。在非常发达的世界,权威与暴力手段的实施就范围而言,成了总体性的,形式也更科层化。如今,人性本身呈现于我们眼前,在地球两端,超级大国各方正最大限度的集中力量,为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

现在,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力。那是些什么价值呢?甚至在未陷入恐慌时,人们

也常感到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式微,而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普通人感到适应不了他们如此突然就要面对的更广泛的世界;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自我,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这些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们开始为一种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5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

—

由于社会学的想像力对不同类型个人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职业生涯都是有意义的,具有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样的杂乱无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明男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

这种想像力的第一个成果——因而也是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在许多时候,它是一个可怕的教益,而在许多方面,它又是美好的。我们不知人类潜质的限度何在,既有高尚的追求也有自甘堕落,既有剧痛也有欢欣,既有令人愉悦的残暴也有理性的芬芳。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人性”的限制竟是如此广泛,以致让人感到恐惧。我们已开始在某一社会中,一代代的人的个人生活;他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之中,而这个历程又存在于某个历史序列之中。因为他正在生活这一事实,他就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做出了贡献,无论这贡献多么微不足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在社会和历史的推进作用下塑造出来的。

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这是他的使命与前景。实现这个使命与前景是经典的社会分析家的标志。他是斯宾塞的特质——浮华,综合,统观全局;是E·A·罗斯的特质——优雅,直率,寻根究底;是孔德和涂尔干的特质;是复杂而微妙的曼海姆的特质。它是马克思具备的优秀的学者品质,是产生凡勃伦的超常的反讽性洞察力的原因。它促发了熊彼特对事实的多角度构建。它构成了在深刻性与清晰性上不比韦伯逊色的W·E·H·莱基的心理学视野的基础。它体现了当代对人类与社会研究的精华。

在回归到个人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在生活中的交织等问题之前,没有哪个社会研究能完成其学术探索的过程。无论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问题,考察的社会现实的范围是狭小还是广泛,那些充满想像力地预见到他们工作前景的经典的社會分析家总是不断地問三种类型的问题:

(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涵义?

(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

(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无论他们的兴趣点是强大的国家还是细微的文学格调、家庭、监狱、教义,经典的社会分析家都要问这些问题。它们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是具有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人必然会提出的問題。因为这种想像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

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像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

8 总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希望借助社会学的想像力,把握世事,理解作为社会中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的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他们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他 not 是一名永远的陌生人,那么他至少是一个局外人,当代人对自身的这种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的相对性与历史的改造力量的深刻体会。社会学的想像力正是这种自觉所结出的最丰硕的果实。通过它,原来思维活动只局限于狭小范围的人们会突然对所置身的狭小空间产生新奇的感觉,而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对此早已熟悉。不论正确与否,他们慢慢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总结,协调的评价和总体性的定位。对他们来说,原先似乎正确的决定现在却显得只是大脑莫名其妙的愚钝的产物。他们好奇的能力重又焕发。他们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价值的再评估:总之,通过他们的反思和感受力,他们理解了社会科学的文化涵义。

二

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别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这个区别是社会

学想像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
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也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

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因而,表述及解决这些困扰就可能依赖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一个整体,有赖于他切身所处的环境——即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困扰是桩私人事务:他感到自己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它们涉及到许多处于类似处境的组织,这些组织进入到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它们涉及到不同的环境重合并相互渗透(以形成更宏观的社会和历史生活的结构)的方式。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关于什么价值真正受珍视,什么东西真正威胁到它,人们常常会有争论。这个争论往往没有焦点,即便这只是因为不像广为流行的困扰,论题的本质在于它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9

根据这些方面,可以考虑一下失业。当一座 10 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人失业时,那么这是他个人的困扰,为了救济他,我们最好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行,他的技能和目前存在的各种机遇。但是,如果一个有五千万雇佣大军的国家,却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这就是个公众论题,我们也许不能指望在某个个人所能获得的机遇范围内找出解决办法。机遇的结构已经解体了。为正确地表述问题和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零星散布的个人处境和品行。

再看看战争。当战争爆发时,战争中的个人问题也许是怎样在其中保全生命或光荣地牺牲;怎样从中捞一笔钱;怎样在军事系统中爬得更高,使生命更有保障;或怎样为结束战争做出贡献

献。总之,根据个人的价值,发现一种环境并在其中保全生命或更有意义地死亡。但是战争的结构性的论题则与战争的原因有关;与战争把什么样的人匆忙推向领导职位有关;与它对经济、政治、家庭、宗教制度的作用有关,与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存在的无组织的不负责任有关。

再说婚姻。在婚姻生活中,无论男人和女人,都会体验到个人的困扰,但当离婚比例达到婚后不满四年,每一千桩婚姻就有 250 桩解体时,就呈现出结构性的论题的迹象,这个论题与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以及其他与婚姻和家庭制度相联系的程度有关。

10 或者还可以看看大都市——可怕、美丑兼具、壮观拓展的大城市。对于许多上层阶级人士,解决“城市问题”的个人方法是在市中心拥有一间带私人车库的公寓,而在四十英里之外 100 英亩的私人领地上,拥有一个亨利·希尔设计的套房,加伦特·埃克白装点的花园。在这两个由他所控制的环境中(两边都有服务小组,且有直升飞机连接两头),大多数人都能够解决由城市的现状所引发的许多个人的问题。但所有这些再怎么体面,也不能解决由城市的结构性事实所引发的论题。该如何对付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怪物呢?把它整个分解为一个个分散的单元,而把住所和工作地合并起来?对之进行重新翻建?还是我们撤离出来,炸毁它,然后在新的地点根据新的计划建设新的城市?那么,这些计划应是些什么内容呢?由谁来做决定,当作出选择后,又由谁来实现它呢?这些都是结构性的论题;为了面对与处理它们,我们需要考虑影响了无数环境的政治与经济论题。

只要经济的计划程度太高,以至造成萧条,那么失业问题就不再能通过个人途径解决。在民族国家的体系和不平衡的世界

工业化进程中,只要战争仍是固有的,那么不管有没有精神治疗的帮助,普通人在其有限的环境中是没有力量解决由体制或体制缺失所施加于身上的困扰的。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只要它把妇女变成受宠爱的小奴隶,而男子则成为她们主要的供养人和未断奶的依靠者,那么通过纯粹私人的途径始终无法解决实现美满婚姻的问题。只要过分发达的大都市和过分发展的小汽车还是过度发达社会的固有特征,那么个人才智和私有财产就解决不了城市生活的论题。

我已强调过,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像力。

11

三

在我们的时代,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要表述这些论题与困扰,借助描述我们这一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我们必须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而尚未感到它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

体会到**幸福**；而当他们感到所珍视的价值**确实**被威胁时，他们便产生危机感——或是成为个人困扰，或是成为公众论题。如果所有这些价值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感到恐慌，感到厄运当头。

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又如果，最终，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觉察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一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哪些价值受到威胁以及什么在威胁这些价值，这些都未被表述出来，总之，它们还没有成为结论，更远远未被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而陈述出来。

12 在 30 年代，除了一些希望破灭的工商界人士认为存在经济问题之外，人们几乎没有多少困惑，而经济问题也只是一些个人困扰的堆积。在这些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的争论中，马克思的论述以及对他的著作未得正式承认的阐释或许规定了论题的主导论调，一些人开始用这些论调来理解他们个人的困扰。人们很容易发现哪些价值受到威胁，它们也被所有人珍视；而威胁它们的结构性矛盾也很容易发现。对这两种情形，人们的体验既深刻且广泛。那是个政治的时代。

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受到威胁的价值往往却既未被普遍承认为价值，亦未被普遍感受到威胁。许多个人的不安未

被表述明确;许多公众的心神不安和具有重大的结构关联意义的决策从未成为公众论题。一些人接受了传承的价值,比如理性和自由,对他们来说,焦虑本身才是困扰,淡漠本身才是论题。这种焦虑和淡漠的处境,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

这一现象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它常常被观察家解释为现在需予以阐明的问题类型已发生变化。我们常常被告知,我们时代的问题,甚至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移出外部的经济领域。现在,它们与个人生活质量有关联,这事实上还伴随一个疑问:是否不久将没什么东西能被恰当地称为个人生活。这些观察家所关心的,不是童工劳动而是漫画,不是贫困而是大众休闲。许多大的公众论题和私人困扰是根据“精神病学”来描述的——似乎往往是一种可怜而无用的努力,以避免现代社会大的论题与问题。这些描述似乎往往也仅依赖于对西方社会甚至只是美国的狭隘的兴趣,因而忽视了全人类的其他三分之二;这种描述还往往武断地把个人生活从宏观的制度中抽离出来,而生活正是在这些制度中表演的,有时,制度比童年时代的切身环境更严重地影响了个人生活。

例如,不考虑工作问题,甚至就不能阐述休闲问题。不从当代家庭与社会结构中新制度间的新关系里考察当代家庭的困境,就不能将漫画书之外的家庭困扰表述为问题。不了解不适应及淡漠在何种程度上形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氛围,就不能将休闲及其日益贫乏理解为问题。在这种氛围中,不意识到进取心(它是一体化经济中人们工作生涯的一部分)的危机,就不能陈述和解决“个人生活”的问题。

正如精神分析学者所不断指出的,人们往往“越来越感到被来自自身内部而他们又不能确定的朦胧力量所驱使”但像厄内

13